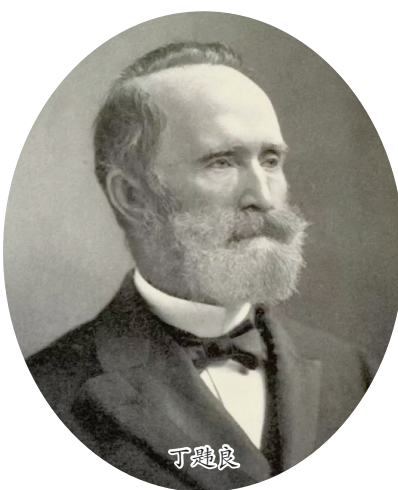


校史正本

# 美国人丁韪良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吗？

·王义道



丁韪良

北京大学是由清朝中央政府开设的第一所综合大学。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仅存的少数硕果之一。这是因为开办大学堂一事在“戊戌变法”之前的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已由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等人提议,并符合慈禧太后培植人才的旨意,而当时其他变法措施基本都被裁撤了。这时朝廷任命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简称“管学大臣”。

当年规定大学堂还兼着一个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责,即管理全国大中小学,主要为全国举办大中小学做样板。它确定全国大中小学的章程、规范课程和厘定教科书,但不涉及各省、府、县、镇的大、中、小学的行政和教职任命。而对京师大学堂自身的事务,孙家鼐却管得很细,例如提名兼通中西学和西学、曾多次出任驻外使节的许景澄任总教习。但做时却因曾在俄国进行谈判,不能到任,孙就自己兼任总教习。他聘请原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并向朝廷建议将他的三品虚衔提升为“二品”,待遇从优,得到皇上批准。他明确教习有总教习和分教习之分。丁韪良不愿任“分教习”,遂给了一个总教习之名,但只能“专理西学,仍与文明程度,其非所应办之事概不与闻”。他提名声誉卓著的学者张元济为京师大学堂总办,相当于常务副校长;还任命了若干“提调”分管学生训导、教务、庶务、文书、图书仪器等事务。后因张元济工作实在太忙,无法分身,就建议江西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担任总办一职,并建议皇上派遣李盛铎、李家驹和杨士燮(后两人已任命为提调)三人去日本详细考察大学的举办与科目的设置等事。不久,李又被奉派到日本任使节,就只得将原翰林院编修调任京师大学堂提调的黄绍箕任总办。孙家鼐上奏皇上说明自己对大学堂科目设置的想法,先通识、后专业,现在看来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大学堂举办后他又积极谋求附设分科的医学堂,并努力筹措经费,设法扩充图书仪器,经营建筑修缮等,但他的工作遭到陕西道监察御史吴鸿甲的弹劾。吴鸿甲告御状批评

大学堂办得不好(如大学生少、中小學生过多等),且有“靡费过甚”的问题。这样,孙家鼐向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奏陈大学堂整顿情况,内容极为详细,包括申辩大学堂为什么要附设中学和小学以作为全国表率等。由此可见,孙家鼐是尽职尽责地掌管着京师大学堂的。从他的官职名称和实际工作,都称得上是实实在在的京师大学堂的首长,也可以说是教育部兼管京师大学堂。后来他因受到慈禧太后根据吴鸿甲奏折所陈的批评,以及不满废黜光绪皇帝而辞职(1899年12月26日准辞)。但他确实应该算是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以后接任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对中西学的了解更为丰富。1900年义和团进京,京师大学堂被视为“洋学堂”而受到冲击,许景澄经慈禧太后批准,于1900年7月6日停办大学堂。直到1902年1月西太后从西安避难回京后又表示想要“变法维新”了,首先就从恢复京师大学堂做起。

但过了两年,清政府根据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奏请在朝廷设立“管理全国学务大臣”(简称“学务大臣”)管理全国教育,而京师大学堂则是在学务大臣领导下专设“总监督”一职,专司大学堂的全部工作。这样京师大学堂就从“一个教育行政机关兼最高学府”变成一所单纯的教育机构——大学了。第一任“总监督”是张亨嘉,他在就职典礼上只讲了一句话:“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笔者曾写过两篇文章:《首任校长的训示》和《论自爱》,均详细阐述了他的办学理念。京师大学堂的职能改变后,他应该算是北京大学的第二任专任校长了。

辛亥革命后,1912年成立的北洋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复辟“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不久,政府又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这样,复辟就正式获得了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称号。

这样根据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就出了三位“第一任校长”。这已不免使人糊涂了,但是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在庆祝北大建校120周年后,网上忽然又多出来一些舆论,说北大第一任校长应是美

国人丁韪良。其理由是孙家鼐的管学大臣只相当于教育部长,而丁韪良是“总教习”,相当于京师大学堂的校长。最近网上又有一个很长的视频,其标题是“美国人丁韪良:被遗忘的北大校长”。由著名作家庄秋水详细介绍了丁韪良,但是她并未明确表示丁韪良应是北大校长。尽管这个问题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已由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说清楚了。在他当年出版的著作《老北大的故事》一书中有一篇文章“不被承认的校长——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已经详细阐明了丁韪良作为实际工作仅一年多的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有人对此颇多议论。

究竟丁韪良是否是北大校长?今年是京师大学堂成立125周年,这个问题应该讲清楚。

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何许人也?他在美国出生,1846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后又入新奥尔巴尼长老会神学院研究神学,1849年被立为长老会牧师。1850年经过香港到我的家乡浙江宁波传教近十年,同时也在崇文门(后迁移至杭州,为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前身,院系调整时之江大学合并到浙江大学)教过一些天文、地理等课程。他能熟练地讲宁波话,能向群众讲解《圣经》,以后他用五年时间熟练读了中国的四书五经,并学会了中国官话。1858年到北京为美国公使列卫

廉当译员,参与起草《天津条约》。他将美国人惠顿所著《万国公约》一书翻译为汉文,并于1864年出版。该书深受中国朝野欢迎,多次再版,还被翻译成日、韩等国文字。他为了更好地理解国际公法,曾回美国一年多在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1865年他受聘于同文馆为教习,1869年又被任命为该馆总教习,同时辞去了长老会的教职,直至1894年因病辞职。他可说是一位难得的西中兼通的洋人了。

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前,丁韪良被孙家鼐推荐为西学总教习,并且经光绪帝批准将他的在同文馆的虚衔三品总教习提升为二品。由于总教习许景澄当时不在国内,总教习暂时由孙家鼐亲自兼任,而升为管学大臣,所以当时一般称呼丁韪良的时候多数是省去了“西学”两字,而直接叫“总教习”。但他本人上书的文件里却一直是写着“西学总教习”的。当年大学堂一般称呼教授为“教习”,次一级为副教习,也有少数助教。总教习有推荐聘请其他教习、安排课程、考试、确定教材与仪器设备等资格。但他没有单独全面评价、处分学生的资格,这需要与相应的“提调”来共同处理。在行政职务上,他比“总办”要低。例如,当年京师大学堂曾发生过学生闹事的事,均是总办和提调来处理,丁韪良就无权过问,符合孙家鼐给他设定的权限。所以充其量他只能说是“教务长”,甚至是副教务长(因总教习可认为是教务长,他只是西学总教习,在京师大学堂未成立之前,他已跟着孙家鼐做了一些筹备工作,比如,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28日(阴历),孙家鼐亲自带着丁韪良以及一些司员到天安门内马神庙查看340余间房子修缮后是否可作为京师大学堂的临时用房。以后,在1901年太后皇帝尚未回京时,丁韪良曾以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的名义请庆亲王奕劻给光绪皇帝发电报,要求赶紧指派管学大臣(原管学大臣许景澄因反对义和团烧杀外国使馆与节被慈禧太后处死),已于1900年7月28日被慈禧太后处死),恢复京师大学堂。这是他所做的一件大事,但

庆亲王只批了一句话:“回銮后再行请旨”,没有达到目的。1902年复学后,丁韪良虽仍是西学总教习,但档案里大部分材料都是他为洋教习讨要补发大学堂停学期间拖欠他们的薪水的记载。档案里开列拖欠薪水的有8位洋教习,以丁总教习为首(每月500两),人为每月350两,2人稍少,拖欠总教习丁韪良为9000两(按18个月计),多数为6300两。这使他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十分恼火,以后以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8名洋教习。

从这里看到,丁韪良只在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1898-1900)的一年多时间中发挥了作用,但也是在管学大臣孙家鼐和许景澄的领导之下做事。我从孙家鼐向朝廷呈上的几个奏折的内容看,对他的评价要比陈平原文章的高不少(陈文有语:“孙家鼐主持大学堂事务者,多不知大学为何物,只好任丁(韪良)博士‘越俎代庖’了”)。我觉得丁博士是“越俎代庖”不了的,大权还是掌控在孙家鼐手中。1898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京师大学堂开学时仅有学生160人(其中大多数为中小學生);一年后到1900年2月住校肄业学生才达到238人,其中算得上大学生的仕学院(当时仅设这一个学院)学生仅27人,中学生151人,小学生17人,附课学生43人。彼时仕学院主要课程是西学(包括算学、理化等及外国语文),因为这些学生对国学经典已有相当根基,只需补一门中学课程[先为经史(主要研习御纂《七经》与御批《资治通鉴》),后为政治典史]。那时教习8人,洋教习8人,西文副教习12人,分科分堂授业(以上根据时任管学大臣许景澄奏折),所以丁韪良等西学教习是能起到相当作用的。由此可见那时候京师大学堂中真正的大学生很少!这是因为全国中小学太少,各省稀有合格的人选可以进入大学堂学习。所以大学堂要高中、小学,由自己培养。从这里也可见到,京师大学堂所以开始兼做全国教育行政机关,就是为了给全国举办大中小学做榜样。

由此可见,将丁韪良说成是北京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是很不恰当的,更何

况校长的首要责任是落实学校举办者(当年是前清政府)的旨意,这是丁韪良所完全做不到的,因而他后来被轻易解职。要是他是校长,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被张百熙免职,竟连慈禧太后都没有被通报一声(仅通报了外务部,还再次明确教习有“总教习”和“分教习”之分;可见总教习的地位)。但丁韪良在自己的英文著作以及国外报纸报导中,竟然都被称为是北京大学(当时国外也有将“京师大学堂”译为“帝国大学”)的校长(President)。例如:《北京之围》(The Siege in Peking, 1900)、《中国的学问》(The Lore of Cathay 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 1901)和《中国之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 1907)等书,都在封面或扉页上(见上)不断地写上“中国帝国大学校长”(见上述陈平原文)。他当然知道,他任职同文馆(当时他亲自将其翻译成为 Peking College 或 Tungwen College)有30年左右,也许那时他这个总教习勉强可译为校长(President),但这几本书上指的明明是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China)啊。这是他高傲自负的虚夸炫耀的表现。他的任职明确,他怎么可能当校长?而在美国报刊上这样宣传,美国人当了“中国帝国大学”的校长是多么光彩、耀人眼球!也许正是因为他的高傲自负,为张百熙所不容,才是辞退他们背后的重要原因。

不过,不管他的职务名称是什么,他在建设京师大学堂过程中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却是可以肯定的。这说明当年清廷在吸收西方文明方面还是比较开放的。不过当年在科学教育、电讯、铁路、海关、税收等方面,中国人毫无经验,要想跟外国打交道,学习相关知识,只能使用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国外并非是声名显赫的专家,这也是形势所逼。当前我们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必须更加包容地扩大开放,使国际上更多学术造诣深厚、声名卓著的专家学者能来中国参与工作和建设。这样,我们的“一流”才能经得起全球性的考验!

【注与致谢】本文除参考上述陈平原原文外,还参考了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志》(第一卷)、《北京大学史》(1)1898-1911,郝平著《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宁波江北区政府政协谢振声提供了部分资料,档案馆邵儒楠对文章作了修改,特此一并致谢!(作者为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校史钩沉

## 时局与抗争

### ——20世纪20年代后期北大的重组与“护校运动”

·贺天行

1928年12月17日,胡适在上海平静度过自己的三十七岁生日。这天,他在日记中如是记下一笔:“我的生日和北京大学的纪念日同日,故在北京时每年的生日都很热闹。今天见报上记北大学生举行三十周年纪念,经费由学生自备,不禁为之一叹。”

胡适日记中北大“而立之年”校庆日的寥寥,对应着一段“亡校”历史——一段北大是否独立存续的历史。这段历史也伴随着对“亡校”的抗争——北大师生的“护校运动”。“亡校”之危机,亦如同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不同群体、不同人物在倾轧中对于这所学校传统的歧异理解和希冀。

“覆辙坚冰至” 1920年代后期的若干年,对于北京大学而言,仿佛一个“盛筵必散”的故事。早在1922年北大“讲义风波”之时,胡适曾撰文援引《史记》中“暴得大名,不祥”的古训对“五四”新文化的策源地寄寓感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首都氛围为之丕变。惨案百日,周作人称其“含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起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三一八”惨案的次日,奉系军阀进京,“五四”以来北洋当局与知识界之间心照不宣的平衡彻底打破。对于北大而言,不仅《语丝》等刊物被查封,李大钊、高仁山两位知名教授相继被捕杀害,代理校务事务的蒋梦麟等主事者亦不得不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旋即南下。《周易》云:“履霜,坚冰至。”日后,周作人在回忆录中正式以“坚冰至”三字作为叙述这段历史的章节标题。

除却政局恶化,数年来北洋政府的教育经费日益支绌,北京国立高校的经济状况几走到山穷水尽,欠薪问题迟迟难以解决。9月30日《晨报》载:“北大以积欠某店二千元,愿将该校器具查封抵作。”此外,北大校内多年积累下来的人事纠葛亦盘根错节。与此同时,南方的国民革命正如如火如荼。因此自1926年起,北京高校的师生纷纷“孔雀东南飞”,北京大学无复往昔的济济人才之盛。蔡元培、胡适已于这年之前离开北京;林语堂受聘于家乡的厦门大学,又招徕鲁迅等一批友人同住;围绕着(观

代评论)杂志的北大教授圈子亦难以继续在北京立足,南下武汉大学等处谋食……及至1928年5月,胡适作客南京中央大学,在欢迎宴上被主办方强逼作答辞,感慨“今者北大同人,死者死,杀者杀,逃者逃,北大久不为北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奉系当局合并改组北大,师大、艺专等北京国立九校,北京大学的名称与独立亦付诸乌有,开启了一段“亡校”的历史。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北洋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任命刘哲为教育部长。出于加强控制及重组资源以纾解经费困境等动机,当年8月内閣通过教育部分并改组北京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校”的计划,刘哲兼任校长,“北京大学”不复存在。借整顿学风之名,刘哲在京师大学校推行一系列举措:学生须亲自签署“不入党籍”之愿书,不得组织学生会、学生联合会,各科部一律禁用白话文,教室内男女分舍以示“尊敬女生共维礼教”……

经此之变,部分北大学生相约以暂不注册对抗改组,但当局以开除学籍相胁,学生亦不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然而,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奉系的政权已摇摇欲坠。

“蜀洛相争”

1928年6月初,张作霖退出北京,北大学生随即发起复校运动。经年压抑于军阀之手,《北大复校运动宣言》高扬起北大之为北大的“光荣之历史”与“固有之精神”,要求脱离京师大学校,恢复独立。

方欲柳暗花明之际,事情再起波澜。当年6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七十次会议,蔡元培以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的身份提议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合并北京国立各校,但经章宗祥提议将京师大学校改名中华大学,得到多数人赞同。会议最终决定更名中华大学,蔡元

培任校长,未到任前由李石曾代理,并未恢复各校的独立地位。所谓“中华大学”,意在与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相呼应,凸显三所国立大学的特殊地位,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构建三个学术文化中心的思路相一致——“北京易帜”后,故都更名为北平,不复为首善之区。

理解20年代后期北大的“不祥”之境,除了学生们所控诉的“军阀摧残”、南京当局推行的制度性因素外,人事上的纷争及其背后对“五四”以来道路的不同体认,或许是更为内在的因素。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七次会议,讨论中央大学、中华大学校长等事宜。蔡元培在会上报告北大问题经过,认可一周前将京师大学校易名为中华大学的决议;同时表示,自己不愿兼任中华大学校长,推请李石曾担任。不明就里的胡适旋起立提出:第一,北京大学之名不宜废除;第二,李石曾派别观念太深,不宜担任校长,仍请蔡元培自兼。在胡适日记的记述中,自此“风云大起”。这场会议的波澜,在吴稚晖的发言中达到高潮。吴氏与易培基等人一同为李石曾辩护,又挟党元老之威,拈出

宋代“蜀洛相争”的旧典来比拟胡适在北大所处的位置,暗示其在校内经营党争。不过在胡适眼中,吴稚晖聚焦于“蜀洛相争”之说,本身即是一种偏见。

无论二者孰是孰非,关于人事纠葛的观察确乎渊源有自。由于立场、乡籍、院系、教育背景等多重分歧,20年代的北大即有所谓“法日派”与“英美派”之斗法。基于当时的背景,无论当事人本身意愿如何,舆论界观察20年代后期北方教育界的领导权,有所谓“蔡李之争”的说法。

身处纷争中的不同阵营,针对反李而拥蔡者,周作人则指出“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周作人的体认固然持门户之见,但并非没有道理,尤其是“蔡李本是一派”之说,点明了20年代中后期某种微妙的政治语境。蔡元培与李石曾同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蔡元培,与吴稚晖、张静江一同为蒋介石政权提供合法性的依托,政治上亦同进退。而对于极力主张蔡氏北归的师生来说,他们所念兹在兹的,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作为符号的蔡元培。

事实上,北大迟迟难以恢复独立,

亦源自蔡元培、李石曾多年来共同的目标性构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效仿法国教育制度,将中央的教育部改为大学院,统一管理全国的学术教育事宜,以蔡元培为首任院长。同时,大学院拟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立一所大学来管理全区的学术教育工作,这是蔡元培、李石曾早年教育理想的落地。蔡、李皆曾旅法多年,交谊甚笃,对法国的大学区制度颇为倾心,并早有在中国推广的心愿。蔡元培1922年曾撰《教育独立议》,倡议学习法国设立大学区,其初衷在于实现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学区制率先在江浙推行,但很快面临水土不服,引发反弹。1928年8月16日大学委员会会议,李石华代表李石曾提请在平津、河北推行大学区制;蔡元培虽同为这一制度的早期倡导者,但此时在会场“未赞一辞”。提案最终通过,蔡元培翌日辞职离宁,9月21日,国民政府决议国立中华大学在大学区框架下改称国立北平大学,任命李石曾为校长,李石华为副校长。以北大为首的平津两所高校纷纷抵制决议,推进复校运动,风潮迭起。

北大学生在《大公报》撰文公开表示抗议态度,再次聚焦于干涉“北大精神”的话语:“校内特有校风与精神,亦因改组或合并而崩离析,不是活活把北大枪毙!”11月29日,连日抗议无果的北大学生赴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砸碎牌匾,又游行示威至李石曾、李石华住宅捣坏门窗,复校运动进入高潮。

面对迭起的风潮,蔡元培在南方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他并未允诺回归北大,一面面对护校代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面表示:“李先生办学主张,与余相同,其在北平大学主持教育,与余无异。余与李数十年患难之交,反李即是反余。”奉系倒台后蔡元培对于复校及回校的冷淡态度,在北大内外引起一些微词。北京易帜不久,北大学生创立谷风社,推出《谷风》半月刊,其第二期刊载一篇题为《救救蔡先生》的短文,以为“我们青年的导师”不该“这样麻木不仁”。自然,老校长有自家的隐衷,此类微词大抵也不会左右蔡氏的政治决断。

最终,在吴稚晖的调停下,北大学生于1929年初与当局达成协议:北平大

学区内原北大文、理、法三院改称“北平大学北大学院”,陈大齐为院长,以示保留北大独立性质。风潮终于告一段落。

“北大的支路”

1929年6月17日,南京政府决议停办大学区制。同日,师生在北大第三院举行“三一八”纪念碑竣工启事。8月,北大与师大相继复校,历时两年终得恢复独立。尽管各校名与建制恢复,由于经费无着,人才流失,此时的北大仍徘徊在“山穷水尽”(胡适语)的边缘。直到1930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为校长,北京大学始重回正轨。蒋氏上任即着手改革,胡适诸公归来助力,北大历史上一个不同于“五四”和蔡元培的时代拉开帷幕。这是后话。

蔡元培终究没有回到北平来,但他已成为北大精神上永远的校长。北大复校后的第一个校庆,蔡元培应邀为纪念刊作序。老校长寄语北大同人“要去尽虚荣心而发发自信心”,继而批评一部分北平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缺乏自省,“好引过去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尤以五四一役为口头禅”。他希望师生不必凭藉聚光灯中心的特殊地位,“而自能崭露头角”。翻阅同期纪念刊中的文字,更常见的还是复校成功之际那种“舍我其谁”式的礼赞之辞——“独我北大,至今巍然”。

一年后,周作人亦应邀为北京大学的校庆撰文。回想起三、四年来北大的浮沉与自大的心路,周氏当是感慨遥深。在这篇《北大的支路》中,他自然也提及近年来的风波,继而提出自己的希冀,“北大的学风宁可迂阔一点”,“走他自己的路”——“我并不抱着什么北大优越主义,我只觉得北大有他自己的精神应该保持,不当去模仿别人,学别的大学的样子罢了”。

怅触更深的或许还是胡适。又过了将近二十年,国民政府大厦将倾,北京大学在解放军的围城声中迎来自己的“知天命”之年。生辰与校庆同日的时任校长胡适,为了北大五十周年的庆典筹备多时,此时却不得不不在校庆前两天乘坐南京政府专机仓皇辞蜀,自此再也未能回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北大。

(作者为北大中文系2023级博士研究生)



20世纪20年代高校重组的“成果”——北平大学医学院(今北大医学部的前身)